

从两汉人名看汉代的神仙信仰

杨 颀 慧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2)

摘 要: 汉代人名中有大量反映长寿、长生观念的用语, 而且其时代集中在西汉武昭宣三朝。这反映了神仙信仰的社会影响在武昭宣时期发展到顶峰, 此后逐渐衰落。神仙信仰在汉代的盛衰有着复杂的原因。

关键词: 人名; 神仙信仰; 汉朝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77(2007)01-0186-05

人名是区别人与人的符号, 可是这个符号并不简单。人名不仅反映了个人的兴趣爱好、生活理想以及价值取向, 而且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尚、思想信仰。在阅读史籍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两汉时代出现了大量祈求长寿的人名, 其数量之多、时段之集中颇耐人寻味。下面就此历史现象做一简单考察。

一

在两汉人名中, 反映长寿观念的语词大量存在, 这是两汉人名的一个显著特点。据本人粗略统计^①, 两汉时反映长寿观念的语词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 名字中含单个“寿”字

名字中含“寿”字的共有 40 人, 西汉 25 人, 东汉 15 人。其中吕后时 3 人, 景帝时 2 人, 武帝至宣帝时 16 人, 成帝至西汉末 4 人。东汉的 15 人生活时代分布较为均匀, 从光武帝到献帝时均有。列举如下:

齐寿 贾寿 朱寿 陈寿 曹寿 李寿 叔寿 寇寿 温寿 曹寿 鄧寿 邓寿 何寿 张寿(2 人) 刘寿(7 人) 王寿(2 人) 孙寿(2 人) 伏寿(2 人) 许任寿 耿寿昌 刘元寿 赵奉寿 刘寿福 刘寿汉 刘寿光 张寿王(2 人) 吾丘寿王 皇甫坚寿 寿(见《汉书·艺文志》, 姓不详)

(二) 以“延寿”为名

名“延寿”者 12 人, 全为西汉人。武昭宣三朝 9 人, 景帝、元帝、成帝时各 1 人。

许延寿 张延寿 韩延寿 焦延寿 李延寿 范延寿 甘延寿 刘延寿(3 人) 延寿(2 人)

(三) 以“增寿”、“长寿”、“益寿”为名

取此类名者 6 人, 武昭宣时 5 人, 成帝时 1 人。赵增寿 刘长寿 其益寿 公孙益寿 刘益寿(2 人)

(四) 以“千秋”为名

取名“千秋”者共 11 人, 全为西汉人。高祖时 1 人, 文景时 1 人, 武昭宣时 9 人。

谩千秋 吴千秋 宣千秋 田千秋 韩千秋 蔡千秋 张千秋(2 人) 刘千秋(2 人) 夏侯千秋

(五) 以“延年”为名

名“延年”者 26 人, 25 人为西汉人, 1 人为东汉人。武昭宣三朝 22 人, 元成时 2 人。另一人见《汉书·艺文志》, 具体年代不详。

许延年 雕延年 孔延年 韩延年 张延年 田延年 解延年 乘马延年 严延年 姬延年 东郭延年 李延年(2 人) 杜延年(2 人) 刘延年(9 人) 延年(2 人)

(六) 以“彭祖”为名

取此名者共 11 人, 全为西汉人, 高祖时 1 人, 文帝时 1 人, 景帝时 2 人, 武昭宣时 7 人。

窦彭祖 严彭祖 刘彭祖 张彭祖 邓彭祖 黎彭祖 直彭祖 蔡彭祖 赵彭祖 彭祖(2 人)

(七) 以“万岁”、“万年”、“万世”、“长年”为名

取此类名者共 15 人, 西汉 13 人, 东汉 2 人。其

^① 本文所统计的人名均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 为节省篇幅, 具体出处不再标明。由于史书记载不详, 统计时对许多人的生活年代只能做一模糊推测, 其间误差在所难免。对于生活时代跨越几位皇帝统治时期的人, 其生活时代按最早在位的皇帝时期统计。

收稿日期: 2006-04-20

作者简介: 杨颀慧(1979-), 女, 河南平顶山人,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

中武帝时 1 人,宣帝时 9 人,元成时 3 人;章帝、桓帝时各 1 人。此外章帝有女号“万年公主”,东汉时还有爵位名“万岁亭侯”,因非人名不在统计之列。

刘万世 孙万世 万世 解万年 纪万年
陈万年 单万年 周万年 刘万年(2 人) 万年
(2 人) 赵长年 刘万岁(2 人)

(八)以“久长”、“长久”、“未央”为名

取这类名字的共 6 人,武帝时 1 人,宣帝时 5 人。

刘长久 刘久长(2 人) 刘未央(3 人)

如果说“寿”、“延年”、“益寿”、“延寿”等名字只是表达了人们希望有限的世俗长寿的美好心愿,“千秋”、“万世”、“万岁”、“彭祖”等名字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长生、不死、成仙的强烈渴求。“长生”、“不死”、“成仙”都是追求不朽,“可以被视为世俗的长寿愿望强化的结果”^{[1]23}。汉代神仙信仰的核心就是追求生命的永恒,它融合了世俗不朽和彼世不朽,神仙的观念变得与“长寿及‘不死’相一致”,都是“古代世间长寿欲望的产物”^{[1]38,27}。祈求长寿的人名如此频繁地使用,这是汉代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余英时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有趣现象,他曾专门著文指出,居延汉简中的人名、地名中有大量长寿类用语,“寿”、“延寿”、“长寿”、“益寿”、“上寿”、“延年”、“长生”这类人名在居延汉简中很常见。“首先,带有这类名字的人多数为边塞烽燧的官吏与士卒,这一事实表明普通人与皇帝同样渴望长寿或成仙,这是仙说渗透社会的标志。其次,如此命名的人来自帝国的各个郡,这进一步说明该观念已经传播得既广且快。”^{[1]47-49}长寿、长生成仙的观念在两汉社会影响甚广,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铜镜是汉代重要的生活用品。有的学者在做过大量研究之后指出,汉代铜镜背面的铭文根据其内容可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内容是“对人的寿命永恒表示企盼,他们期望在世间延寿,更羡慕仙人的永恒自由”^{[2]222-224}。

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了两汉社会盛行神仙学说,追求长寿、长生成仙成为一种普遍的世风,但这种描述太过概括。正如俗语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两汉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中,人们追求长生的态度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述统计结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祈求长寿、长生的名字在西汉的出现频率大大高于东汉,尤以武昭宣三朝为最。在以上 127 个人名中,属于西汉时期的共 109 个,占总数的 86%,在这 109 个中又有 84

个集中在武昭宣时期,占西汉的 77%,占总数的 66%。西汉共 231 年,武昭宣三朝历时 92 年,时间长度占整个西汉的 40%。如果此类名字出现频率较为均匀的话,按照概率理论推算,出现在武昭宣时期的此类名字数量也应该占整个西汉时期的 40%左右,67%这个统计结果显然过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多数人的名字都是父母给予的,名字所反映出的思想意识不属于其本人而是属于他的父母。武昭宣三朝历时近百年,宣帝在位 25 年,生活于这三朝的人的父母的生活时代可能属于这三朝,也可能会早于武帝时代几十年,但上限应不会早于汉文帝^①。由于史书记载的局限性,能够青史留名的大多是帝王将相,所以在上述统计结果中刘姓宗室、公卿将相占了较大的比重。但汉代选拔官吏的途径已多元化,许多公卿大臣出身布衣平民,所以该统计结果应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风尚,而不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为了证实这个统计结果的可信性,笔者对居延汉简中吏卒的人名也做了一个统计。李振宏、孙英民两位先生曾经把居延汉简的人名做过整理,考证了其中大部分人所处的时代^[3]。其中有年代可考的人的活动时段从汉武帝太始二年持续到汉和帝永元年间。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其中反映长寿观念的人名做了一个统计。这些人名主要有以下几种:寿(含单字“寿”)、延寿、延年、未央、千秋、万年、长寿、彭祖。以上人名共计 32 个,汉武帝时 1 人,汉昭帝时 1 人,汉宣帝时 17 人,汉元帝时 9 人,汉成帝时 2 人,汉平帝 1 人,新莽时 1 人。以汉宣帝时期最多。汉元帝时 9 人的纪年均为初元、永光年间。初元、永光年间是汉元帝在位的最初十年。这 9 人既然能戍边年龄当在十岁以上,因此他们的父母可能是汉昭帝或汉宣帝时人。汉昭帝时的一人具体纪年是始元元年,即昭帝即位的第一年,因此他肯定生于汉武帝时期。这个统计结果和上面的统计结果有些出入,汉武帝仅有两人,在 32 人中所占比例过低。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居延汉简中人物的活动时段上限是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 96 年),从这一年到汉武帝过世总共也就十年。从总体上而言,和前文对传世史籍所作统计结果比较吻合。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汉代是神仙信仰发展繁荣的重要时期。从汉文帝时期起,神仙信仰就开始普及化、平民化,武昭宣时期是神仙信仰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汉中期以后它的社会影响力逐渐衰落。

① 从汉文帝即位到汉武帝即位,时间间隔 40 年。

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下面就对此现象的深层原因展开探讨。我们先来分析西汉中期神仙信仰盛行的原因。

首先必须提及的是西汉初年盛行黄老学说。黄老之盛行始自汉惠帝，终于汉武帝。黄老学说是道家学说的一个分支，既重治国又重养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恭）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4]卷十八，自然篇 这一学派的得名盖因其祖述黄帝老子之故。在战国时期，黄帝就已被改造成了仙人。《庄子·大宗师》说黄帝得了“道”，“以登云之”；《在宥》篇则详细叙述了黄帝向仙人广成子问“道”从而由人王一跃为仙人的过程。至于老子，在西汉初就已变得十分神秘，据说他“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莫知其所终”^[5]老子韩非列传。汉武帝时，不仅黄帝、老子这些年代古远的人物成了仙，就连二百多年前的黄老学派先师也摇身一变成了世人津津乐道的仙人。《史记·乐毅列传》：“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根据唐兰的推测方法，以三十年为一世^[6]，安期生的生活时代距盖公教曹参也就 120 年。曹参于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为齐相，从盖公学黄老之术，到武帝即位（公元前 140 年）又相距了 60 年。因此安期生的生活时代也就大概比汉武帝早 200 年左右。就是这位隐士兼学者，在汉武帝时却变成了一位海外仙人，“食巨枣，大如瓜”，“通蓬菜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5]封禅书。黄老学派的宗师们纷纷得道成仙，这表明汉初黄老之学已经和神仙思想紧密联系，神仙信仰已经成为其学说的一部分。黄老学说的盛行对神仙信仰的发展、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它在西汉中期的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惠帝、吕太后执政期间，神仙信仰并不流行，因为战乱之后汉初社会

经济破败不堪，普通大众的基本生存都出现了问题，成仙的话题根本无法引发人们的热情。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喜好。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兴趣往往会影响到全体社会成员。从史书记载来看，汉惠帝、汉景帝似乎都对神仙方术不感什么兴趣。吕后对此更持否定态度，张良为了成仙学习辟谷、导引术，吕后就劝他不要自找苦吃，强迫他进食^①。在推行黄老治国之术的西汉诸帝中只有汉文帝曾一度热衷此道，后因方士新垣平的骗局败露而“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7]郑祀志上。上层统治者的态度影响了民间的行为取向，所以在盛行黄老之术的西汉初年长生信仰并没有在全社会流行，只是在汉文帝时期才有较大的发展。在两汉所有的皇帝中，汉武帝可以称得上是铁杆“神仙迷”了。汉武帝一生大搞求仙活动，在他统治期间，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向他进献各种求仙方术，李少君、宽舒、少翁、栾大、公孙卿之流层出不穷：“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7]郑祀志上 汉武帝设立各种杂祠，建造飞廉、桎馆、益寿、延寿馆，举行封禅大典，巡行海上，诸如此类的求仙活动举不胜数。虽然屡屡上当受骗，汉武帝始终痴心不改。汉宣帝也是个“颇好神仙”^[7]王褒传的皇帝，他一即位马上就“复兴神仙方术之事”^[7]楚元王传，“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7]郑祀志下。以上二位，尤其是汉武帝，对长生不老、不死升仙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必然引发全社会对长生不死的狂热追求。因此在武帝和宣帝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人全家都起了祈求长寿的名字。武帝时济北相韩千秋之子名延年^②。宣帝时大司马车骑将军张安世的三个儿子分别取名千秋、延寿、彭祖。宣帝时河南太守严延年，其弟名彭祖。由此可见当时民众追求长生成仙的狂热。当然，汉武帝并非历史上第一个狂热求仙的君王。秦始皇是第一个搞大规模求仙活动的帝王，他“使用极具征服性的强兵、峻法、严刑手段来维护大一统的天下，在政治生活中已经造成严重的对立局面，所以，始皇的求仙

① 《史记·留侯世家》：张良“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② 汉武帝好神仙方术，“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书·郊祀志上》）。他大搞求仙活动是从元光二年（公元前 134 年）时开始（在这一年方士李少君进献求仙方略）。韩延年最早出现在史籍中是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其时韩千秋奋击南粤阵亡，韩延年因此封侯（《史记·南越列传》）。此时距元光二年已 20 年。13 年后即天汉二年（-100 年），韩延年随李陵出征匈奴（《汉书·李广苏建传》），他应该在壮年，可能 30 岁左右。据此推测，韩延年应该是在元光二年以后出生的，韩延寿给他取名时正是汉武帝轰轰烈烈大搞求仙活动之时。

之举并没有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人人图生恶死的生命伦理精神”^[8]，但坑儒事件使方士力量大受打击^①。这也是秦朝和西汉初期神仙信仰在社会上并不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西汉中期以后神仙信仰的影响日渐衰落的原因。

两汉时求取长生成仙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实行的难度都较大。这些方术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服食术、辟谷术与食气术、导引术与行气术、房中术。服食术所服“不死药”主要是草本药物、金玉、丹砂等。这些仙药可以向仙人求取，也可自己制造。仙人不在深山就在海中，前往寻觅恐有性命之忧；制造仙药需用金玉、丹砂等矿物，成本太高，一般百姓也难以承受。辟谷食气术不可食用五谷杂粮，只能进食一些特殊食物，这显然无法长期施行。导引行气之术，较易操作并且有强身健体之效，但功效有限，作为长生成仙之术似乎缺乏说服力。房中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只能私相传授，大规模推行实无可能。方法虽多，可供普通大众使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案还真真是难找。在最高统治者热衷此道时，民众们可能会头脑发热，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好命，但当这些权贵们一命呜呼时，大家也就逐渐理智清醒起来，对长生成仙的真实性犯起了嘀咕。

西汉中期以后，社会危机加重，社会关注焦点由个人的生存问题转移到了社会整体生存的问题。武昭宣时期是西汉的鼎盛时期，但武帝时社会矛盾就比较尖锐，此后流民、边患、外戚等问题一直困扰西汉。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外戚、宦官把持朝政，经济、政治上都出现危机。深刻的社会危机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全体社会成员开始惶惑不安。汉成帝时出现一本神秘的预言书《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这本书预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这个理论对汉哀帝产生了巨大震动，为挽救王朝大运，他改建平二年（前5年）为太初元年，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7]季寻传}。此书在顺帝和桓帝时又曾两次被进献给皇帝^{[9]襄楷列传}。除上层统治者外，下层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感。汉成帝时出现了大洪水将至的谣言：“成帝建始三年（前28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民以水相惊者，阴气盛也。”^{[7]五行志}汉为火德，大水将至还意味着汉王朝国运将终。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正月，社会上又发

生了大骚乱。“民惊走，持囊或楸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7]五行志}关于这次大骚乱，《汉书·哀帝纪》也有记载：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言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五行志》又载：建平“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讙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东汉永初元年（107年）十一月，同样的民众惊恐骚动事件再次发生，为此汉安帝特别下诏，“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9]安帝纪}造成骚乱的原因就是民众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感，担心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大环境下，全社会忧心忡忡，人们的目光聚焦到社会、国家的前途、命运上，能否活命尚且是个未知数，个人生命的永恒就更显得虚无缥缈了。

三

对生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原始本能。从出土的各种考古资料来看，追求生命的永恒是一种极为古老的观念。春秋战国时期，以追求生命永恒、自由快乐为核心思想的神仙信仰逐渐形成，进一步扩大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到西汉中期时，随着神仙信仰的普及和平民化，许多人相信神仙之术可行，长生不老可得。西汉中期以后，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此不再热衷。与西汉中期的狂热相比，从西汉后期直至东汉，人们的头脑相对冷静和理智了许多。虽然汉成帝、汉哀帝、王莽以及东汉许多王公贵族仍然喜好神仙之术，但再也没有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求仙热潮。

追求长生是神仙信仰的核心内容。在汉代人的思想世界中，神仙信仰始终停留在实用技术的层面上。这种古老的观念尚未形成一种深刻、严密的理论，它不乏神秘性但绝没有宗教的神圣性。只有当人们认为它所承诺的种种诉求——主要是长生不老——可以兑现时，人们才会有激情去信奉它。当它所承诺的世俗幸福随着秦皇汉武的驾鹤西去一次又一次落空时，人们的热情不由得冷却下来。

^① “坑儒”事件所“坑”的是“儒生”还是“方士”众说纷纭，林剑鸣认为有儒生也可能有方士，见林著《秦史稿》第4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今采此说。

帝王显贵们花费了庞大的财力、物力虔诚求仙还不能如愿,那么命如草芥的小民们又凭什么坚信自己是有缘人呢?作为一种实用的知识技术,一般民众只是对它持实用主义的态度,它无法持久占据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它是虚妄、荒诞的,是被批判的。谷永指责神仙方术“背仁义之正道”,神仙家、方士“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7]。桓谭明确指出:“无仙道,好奇者为之。”^[10]王充则说:“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4]卷七,道虚尚未宗教化的神仙信仰始终被排斥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当时这些知识与技术以及它们的拥有者确实并不占据话语的权力,也不处在社会的主流,在那个时代里,它们一直受到来自政治与文化两方面的很严厉的批评”^[2]³⁴⁵。当然,由于思维水平有限,这种观念始终潜伏在古人头脑中,但大多数人只是持有“祭神如神在”的态度。以汉成帝为例,他在即位之初罢除了 475 所候神之祠,但晚年为求子嗣又大力招揽方士,恢复神祠过半^[7]。西汉中期以后,真正崇信神仙信仰并身体力行的人群日渐缩小,这个群体逐渐职业化、

宗教化,他们最终促成了原始道教的形成。余英时先生说过:“如果说汉代士人对形体成仙尚存怀疑与保留的话,他们对长寿说看来是持普遍接受的态度。”^[1]⁵⁰我们还可以对这句话做进一步的补充:汉代人对长寿说持普遍接受的态度,武昭宣时期曾经掀起全民性的求仙热潮,此后求仙幻梦破灭,民众对长生不死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 东汉生死观[M]. 侯旭东等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1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3] 李振宏,孙英民. 居延汉简人名编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4] 王充. 论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 唐兰. 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J]. 考古学报,1975(1):7—16.
- [7]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 姜生. 论秦汉时期的信仰——伦理危机[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11—17.
- [9]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0] 桓谭. 新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

责任编辑 张颖超

People's Names in the Han Dynasty and Immortal Belief

YANG Jie-hui

(The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Abstract: Many peoples' names in the Han Dynasty contained various Chinese characters reflecting their belief of immortal life or longevity. Immortal belief rides the crest stage from the period of Emperor Han Wu to Emperor Han Xuan, and later it weakened. Many complex factors led to the rising and falling of the immortal belief.

Key words: people's names; immortal belief; the Han Dynasty